

台南市古刹彌陀寺四百年的滄桑史

釋慧嚴*

摘要：

台南市四大古刹之一的彌陀寺，在現代曾有盧嘉興著〈台南古刹彌陀寺〉、〈再談台南古刹彌陀寺〉二文，他依寺內祖師堂供奉的牌位、《台灣縣志》、《重修台灣縣志》、《范纂府志》、嘉慶 10 年（1805）的《重建彌陀寺碑記》、及昭和 4 年（1929）的《彌陀寺重修碑記》及自己的見證，對彌陀寺的寺史，作了細密的研究，其成果是讓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自明清時代，走過明治時代的兵燹，大正時代被官方佔為衙門之用，後經王兆麟的倡議募款修建，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釋圓斌接任彌陀寺的住持為止，其沿革經緯。筆者曾經依此研究成果，先有〈台灣佛教史前期〉發表於《中華佛學學報》第八期（頁 273-314），後有關彌陀寺的研究收於拙著《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103-111。在此的敘述，着重在王兆麟與彌陀寺的關係，還有頁 642-651 的部份，是探討彌陀寺住持王兆麟創辦台南家政裁縫講習所的經過情形，及其日後的發展，即此講習所，其組織與名稱改為台南家政女學院，後更名為私立台南和敬女學校、和敬商業實踐女學校，至戰後再更名為私立光華女子中學，以至今

*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日校名爲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還有其校地由彌陀寺現址，移至竹園町五千多坪的土地即今台南市勝利路 41 號的經緯。

筆者以上的研究，多少彌補了盧嘉興文不足的部份吧！但是筆者在發表上文之後，先後接觸到釋圓斌俗家的弟弟吳龍一，及其弟子釋印弘、釋印理諸師，從他們那裡獲得新的資料及口述，還有得到一些關於王兆麟的資料，希望將古刹彌陀寺四百多年的滄桑史，作更完整的陳述。因此筆者在該拙文，依時代即明清時代、日治時代、二次大戰結束後，來探究彌陀寺的寺史，最後對戰後中興彌陀寺的釋圓斌，以比丘尼之身，畢其一身奉獻於該寺的功績，作一較爲完整的研究。

關鍵詞：彌陀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從軍布教、王兆麟、釋圓斌

The 400 Year Bitter History of Mituo Temple

Shih, Huey-yen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ancient temples in Tainan, Mituo Temple was a subject of study for Lu Jia Xing who wrote two articles entitled, “Tainan Ancient Temple –Mituo Temple” and “A Further Study on Tainan Ancient Temple – Mituo Temple”. He wrot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by making use of various records as references. Those records include ‘The Ancestors’ Scroll’, ‘the Records of the Taiwan County Annals’, ‘Revision of the Taiwanese County Annals’, ‘Fan Cuan Prefecture Annals’, ‘the Records of the Rebuilding of Mitho Temple written in 1805’, ‘the Records of the Rebuilding Mituo Temple written in 1929’, as well as his own testimony. Thus Lu Jia Xing made a thorough study and research of Mituo Temple’s history and his research gave 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mple’s role ranging from the Ming Ching Dynasty through the war of the Meiji age to the Taisho. During the Taisho period, the temple wa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local court. Later, Wang Zhoa Lin suggested a fundraiser to restore the temple. Post World War II, Si Yuan Bin took over as head of the temple. My article, “The Early Age of Taiwan Buddhist History”, published in Chung Hwa Buddhist Journal, issue eight, page 273-314, makes use of their research. My book, ‘The Buddhist Interaction History among Taiwan, Fuchian Province and Japan’, also includes excerpts from their research in my discussions on ‘A related History of Mituo Temple’ Page 103-111 and ‘Emphasised relations between Wang Zhoa Lin and Mituo Temple’. From pages 642 to 651 I go on to discuss Wang Zhoa Lin as the head of Mituo

* Adjunc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emple when he established the Tainan Housekeeping Institution. I also dissert it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later developments. The name was later changed to Tainan Housekeeping Girls' College. It then underwent further name changes to that of the Tainan He Jing Private Girls High School and the Tainan Business Girls' School. After World War II it became the Private Guang Hua Girls High School. Its location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Zhu Yuan Ding, which covers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square meters and its current address is 41 Sheng Li Road, Tainan City.

My research more or less helped to add more information to Lu Jia Xing's articles. After th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 had a chance to make contact with Master Shi Yuan Bin's brother, Wu Long U and his disciples, Shi Yin Hong and Shi Yin Li. I have obtained more documents about Wang Zhao Lin as well as an oral history from them. I hope I can make a complete historical discussion on Mituo's 400 year history. Thus this article's research will afford us an understanding of Mituo Temple extending from Ming Ching Dynasty through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post World War II. I also endeavor to thoroughly dissert the role of the nun, Shi Yuan Bing, who devoted her entire life to the restoration of Mituo temple.

Keywords: Mituo Temple, Hong Yuan Bi – School of pure land Zhen Zong Ben Yuan, Chaplain, Wang Zhao Lin, Shi Yuan Bing

一、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台灣佛教界，尼衆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我們注目的，她們對已頹危寺院的重建，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往往不會落後於男僧，但台灣佛教界重男輕女的觀念似乎還很嚴重，身爲一位多年來致力於台灣佛教史研究的我，希望透過研究的成果，將她們對教界的努力貢獻事績呈現出來，渴望能稍稍改變台灣佛教界一般人的錯誤觀念。筆者不願在男女性別上作比較，只希望藉此喚起我們的信奉者，能真正理解佛教，特別是釋迦世尊的本懷，眾生平等的精神。

拙文是筆者研究台灣佛教史以來，第一次將視點移至戰後，以具有歷史地位的寺院台南市古刹彌陀寺，及中興該寺的已故住持釋圓斌爲對象。理由是符合筆者上述的希望，還有過去在發表彌陀寺相關的文獻中，特別是日治時代的住持王兆麟，其生平事績，因發現新的史料，有作補充的必要，加上王兆麟、釋圓斌與筆者都是鳳山人，基於自己鄉里出現傑出的佛教人物，認爲有必要將其事績呈顯出來，使鄉里人口耳相傳的人物書之於史，以免日久失傳。因此拙文的形成，有部份是屬田野的調查，人物的訪談。又爲了使讀者能了解明鄭時代以來就有的台南彌陀寺，拙文將先簡介該寺的歷史與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關係，之後敘述日治時代王兆麟的中興該寺及其教育事業，最後介紹釋圓斌在戰後中興彌陀寺、維護歷史文物、及其教化事業的實況。

二、明清時代的台南古刹彌陀寺

衆所周知，位於東區東門路一段一三三號，日治時代的東門町，明鄭時爲東安坊的彌陀寺是台南市四大古刹之一，也是明鄭時代三刹之一，亦是台南人所謂的七寺八廟之一。原彌陀室，是一規模不大的寺院，

由洪元弼創建於明鄭時代。後由台灣第一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 23 年（1684）重建，並延聘臨濟正宗第三十八代戒然（俗姓張名果生），為開山第一代住持。之後同 31 年（1692），第三任台灣縣知縣王兆陞附建彌陀室書院，同 57 年（1718），監生董大彩重建中殿一座，同 58 年（1719），一峰募建閻君殿於西邊暨僧房六間，監生陳仕俊建三宮殿於東邊，如此彌陀室改名為彌陀寺，並置寺田於鳳山縣嘉祥里阿噠甲尾（現高雄縣阿蓮鄉甲尾，在國民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之後，今尚存有阿蓮中正路和蓮段 299、356、250、269、287、288、299、443 及崗山營段 204、218、216、217 等的地號的寺產），¹園一所，年收粟七十二石，又有黃士甫、曾享觀捐寺後園一坵，以充寺的香燈。乾隆 3 年（1738），漢巡台御史單德謨捐修。²嘉慶 4 年（1799），董事黃鍾岳（即黃拔萃一筆者）、³林道生等，鳩眾（指趙朝陽、林中鶴、程肇基、陳德壽、陳廷華）重修，同 10 年（1805）竣工。⁴有關這次的重建，當時的董事們，留下嘉慶歲次乙丑年（10）葭月（11 月）立的〈重建彌陀寺碑記〉，還有同己未年（4、1799）11 月置「彌陀寺」的寺匾、匾額「西方聖人」、同 5 年（1800）葭月（11）中浣（中旬）穀旦梅園書的「大雄寶殿」、及 4 月立的「一片慈雲」。同辛酉年（6、1801）、弟子許名時敬立的對聯「法雨灑瀛東溥沾世界；慈雲光海表提醒沙門」、此外，尚有辛酉年（6、1801）臘月弟子鄭元肅敬立的「鷲峰正氣」、同乙丑年（10、1805）葭月吉旦董事弟子陳德壽敬立的「小西天」、林中鶴、蓮鸞號同叩的「慈

¹ 今彌陀寺住持釋印弘提供。

² 拙著，《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 5 月），頁 108-109。

³ 〈彌陀寺重修碑記〉，昭和 4 年（1929）秋立，胡殿鵬（號南溟）拜撰。

⁴ 杉山靖憲，〈重建彌陀寺碑記〉，《台灣名勝舊蹟誌》（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 年（大正 5 年）4 月），頁 151。

雲獻彩」。⁵依據大正 5 年（1916）出版的《台灣名勝舊蹟誌》〈彌陀寺〉條的話，敘述當時彌陀寺內部的擺設是如下：

入門有朱面、黑面二大像，正殿安置彌陀三體，右祀觀音像，左祀保生大帝。十八羅漢像即列左右兩畔。有匾聯。⁶

此中所說的匾聯，除了以上列舉的嘉慶年間的之外，尙有道光 26 年（1846）仲春總理金成玉敬立的「超然世界」。此金成玉，應是咸豐 8 年（1858）3 月鑄造彌陀寺銅鐘銘文中的「糖間金成玉」，該鐘銘文中上五格，有文說：

臺郡諸鋪戶善男信女鳩金敬造，彌陀寺三寶佛祖前鐘。今將捐緣各姓名開列：糖間金成玉、（下一格）米鋪金永盛，鋪戶陶益金、羅資源、吳豐裕、吳泰山、吳振源、許高發、蘇東盛（敏記）、（下二格）黃正祥記、朱萬裕、黃益和、鄧德瑞、盧德茂、陳榮記、林仁記、石長益，（下三格）王寶順、周蓮發、王保和、徐崇美、信女戴蕭論娘、石辛錠娘，董事石長益，督造僧達源，住持僧正麟，合茂爐造（下四格）大清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三月吉旦敬造，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以上銘文中「糖間金成玉」，糖間意思應與糖業有關的工廠，過去粗製糖加以精製的工廠稱作「糖間」，金成玉糖間的舊址是黃天橫的府第，即東門路五十八、六十號。⁷此銅鐘是「蓮唇型」，撰銘者是曾省，

⁵ 同上註，頁 151-153。

⁶ 同上註，頁 151。

⁷ 盧嘉興，〈台南古剎彌陀寺〉，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1 月），頁 265。

爲福建龍溪縣舉人，嘗寓居府城，而承鑄的合茂爐是福建彰州的名鑄廠。⁸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因與中國的戰事，陷入泥淖，大量消耗軍需器材，又遭同盟國家禁供運軍需物資，缺乏製造武器的原料五金等資材，就發動「金屬回收運動」，搜括民間的五金，以及寺廟的鐘鼎，盡遭徵奪。所以台南市各寺廟的古鐘，除開元寺的梵鐘沒有被沒收外，其餘都被徵集，運到台南運河旁待運日本本土，以充製造武器的原料。因遇太平洋戰事趨於激烈，海運停滯，以致未及運日，即慶本省光復。而彌陀寺的鐘已被人盜賣，復經台南市北區元和宮的信徒購贈該廟懸用，迨至民國五十二年七月元和宮重修將近完成的時候，由彌陀寺管理人黃天橫先生向元和宮管理人洽商，由彌陀寺出資八千元另鑄一個新鐘送去元和宮交換舊鐘，於是原鐘始重歸懸於彌陀寺的大雄寶殿。⁹

又從該寺的後堂配置，上揭《台灣名勝舊蹟誌》記載說：

後堂中央祀速報司爺、嚴君爺像，側立牛頭、馬面。蓋該閻魔，右祠祀關帝，左祠祀痘瘡神像。有壁畫匾額。

其寺中，後堂的匾額，有道光元年歲次辛巳（1821）花月（2月）穀旦，福建台灣水師等處地方副總兵官陽亨斌敬立的「變理陰陽」、咸豐元年（1851）梅月（10）吉置右弟子崑利號叩謝「痘疹尊師」、癸亥（同治2、1862）蒲月（5月）弟子楊必達敬立的「閻王殿」。¹⁰又該銘文也告訴我們道光、咸豐年間的住持是釋正麟，而且尚有僧侶釋達源。

從以上彌陀寺的配置及匾額的內容，可以窺視出自嘉慶至同治的年

⁸ 同上註。

⁹ 同上註，頁 267。

¹⁰ 杉山靖憲，〈重建彌陀寺碑記〉，《台灣名勝舊蹟誌》（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年（大正5年）4月），頁 152。

代，該寺雖名為寺，但其信眾的信仰應是融合地方的民俗信仰，如保生大帝、關羽，很可能其信眾中福建泉州人居多，又從事買賣生意的人亦不少。又可能香火感應也很盛，特別是瘟疫流行時，有助於當地人療治病情，才有供奉痘瘡神像之舉。

三、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末寺的彌陀寺

1895年，日清甲午戰爭，滿清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因此時空背景，台澎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也因此因緣，日本佛教八宗十四派的僧侶，首先是隨軍隊南進軍進入台灣，後因隨著移民到台灣的日本人逐漸增多，各派僧侶在各自總本山的支持下，進入台灣傳教，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派（以下簡稱本願寺派）的布教師是其中之一。該派的從軍布教師踏入台灣，最初的目的是在從軍布教，而從軍布教是起源於明治27、28（1894、1895）的日清甲午戰爭，即以明治27年（1894）10月30日，得到大本營的許可，由本山派遣木山定生巡迴第一軍、第二軍的戰線，及各營所、醫院，從事慰問、布教或喪葬等的事情為嚆矢。明治28年（1895）6月命大江俊泰，從屬近衛師團，該月隨同師團的南征渡台從事布教，同8月命武內外量南征從事布教，同月14日渡台從屬近衛師團，同年9月以小島行薰為征台慰問使，與豐田巍秀、長尾雲龍兩位從軍布教使一起渡台，時駐在台南的是長尾雲龍，這是本願寺派來台傳教的緣起（日本稱之為開教）。¹¹

明治29年（1896）1月23日起，本願寺派陸續派遣開教使來台，

¹¹ 大橋捨三郎輯編，《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開教史》（台北：真宗本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35年（昭和10年）5月），頁1-3。

其中駐在台南的有荻野（後改為宮本）英龍、平田博慈。¹²由於該年 4 月，總督府廢除軍政，改行民政，所以 5 月 28 日，他倆以城內五帝街廟的三宮廟作為真宗本願寺派巡教使駐所，開始進行一般的布教。¹³在此之前，即明治 28 年 8 月，本願寺派的從軍布教師就與彌陀寺的住持石以能、水仙宮住持曾慧義締結本末關係（即總本山與末寺的從屬關係）。之後同 30 年（1897）2 月與三宮廟的徐青揚、大士殿的吳以錦、溫陵祖廟的陳善本、銀同祖廟的林開湛締結本末關係。¹⁴彌陀寺在時局混亂中，獲得真宗本願寺的庇護之下，明治 36 年（1903），董事王昭德、黃加冬等捐資重修彌陀寺，結構頗可觀。¹⁵由此史料可以知道，咸豐年間釋正麟之後，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時，彌陀寺的住持是石以能，這從今供奉在該寺祖師堂的牌位也可以獲得證明。¹⁶同 30 年 9 月本願寺派將

¹² 同上註史料，頁 3。

¹³ 同上註史料，頁 533。

¹⁴ 同上註史料，頁 533。

¹⁵ 杉山靖憲，〈重建彌陀寺碑記〉，《台灣名勝舊蹟誌》（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 年（大正 5 年）4 月），頁 151。

¹⁶ 拙著《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頁 109，曾引上揭盧嘉興文，說盧嘉興於民國 60 年 7 月 23 日獲得當時住持釋圓斌提供了日據時代祖師堂供奉的牌位人名是如下：

臨濟宗示寂沙彌信實彌公覺靈蓮位

住持彌陀寺沙門正麟贊化禪師覺靈

欽命巡台察院兼理學工科給事中大檀越主大老爺單諱德謨蓮座

重興本寺按察副使道管台灣府事檀越主蔣公諱毓英星君

重興開山第一代圓寂比丘傳臨濟宗正宗三十八世戒然張公果生大禪師蓮座

開建本室信官洪諱元弼檀越主星君

臨濟正宗新房分派順寂沙彌友慧法師蓮座

重興彌陀寺圓寂沙門一峰通公禪師蓮座

順寂沙彌志忠鴻公倪蓮座

布教所，移至關帝廟街三十二號（後稱為台町或是本町三丁目），又以東之彌陀寺、西之水仙宮、南之三官廟、北之銀同廟為道場，嚐試向本島人傳教。¹⁷由此觀之，彌陀寺自明治 28 年以來，就成為淨土真宗的末寺的事實。但據昭和 4 年（1930）秋月、胡殿鵬南溟撰的〈彌陀寺重修碑記〉中說的「迨明治兵燹後，又歷大正已充為新豐郡衙，越十二年舊寺還壁，諸佛無聲，敗瓦頽垣，淒涼滿目，更有甚焉者。」由此史料，可以知道明治之後進入大正年間的彌陀寺，即大正 10 年（1921）至 14 年（1925）冬，成為新豐郡的辦公地方。¹⁸這是彌陀寺的地理位置因素，因為在此時期，新豐郡的行政區域，大致為現代的永康、大灣、仁德農業區。而東門乃為關廟、仁德地區進入台南市區的幹道，來自這些農業地區的民眾，是要趕集或是購物，一進入東門即可至被充為公所的彌陀寺洽公的緣故。¹⁹不過大正 14 年（1925），該公所撤退，將空間歸還與彌陀寺，但此時的彌陀寺是敗瓦頽垣，滿目淒涼。由於它是隸屬於淨土真宗的末寺，因此該寺的復建自然是歸屬於淨土真宗。

話說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布教師來台之後，與來台其他宗派如淨土

臨濟正宗順寂沙彌振宗敬公蓮座

彌陀寺住持真宗本派石公以能蓮座

從以上祖師堂的牌位，可以知道自彌陀室成為彌陀寺之後至日治初期，與彌陀寺相關的重要人物名單。又今日彌陀寺祖師堂內的牌位兩座，增加了重興彌陀寺圓寂比丘淨土正宗（應是真宗）釋德明（道明？）和尚一位覺靈蓮座（註：王兆麟）；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暨本寺歷代祖師老和尚蓮座。

¹⁷ 同註 11 史料，頁 537。

¹⁸ 〈古剎重修〉，載於大正 15 年（1926）元月 17 日《台灣日日新報》。同大正 15 年 6 月 11 日《台灣日日新報》〈募資修寺〉。

¹⁹ 楊圳意編撰，〈府城彌陀寺初探〉，發表於「2004 年台灣淨土藝術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2004 年 10 月 16、17 日），頁 7。

宗、曹洞宗的布教師一樣，曾致力於向台灣本島人傳教，但因為語言的障礙，他們雖想盡辦法要學好台語，但是效果都不好，布教的成果也都大打折扣。到了第十代輪番（負責人）片山賢乘的時代，改變布教方針，認為日本人的布教師既學不好或者不願學台語，總本山的布教師輪代亦是一種障礙，不如直接以教化培養本島人布教師作為手段，將本島人有能力的信徒，直接送到日本總本山設立的中央佛教學院學習，使其成為本宗的僧侶，回台之後，教化本島人，以達到擴張教勢，宣揚該宗教義的效果。在此布教方針之下，大正 10 年（1921），開始派遣簡長德、江宗美、李訓銘、王兆麟等留學日本京都。²⁰

王兆麟留日生涯可能是到大正 12 年（1923）2 月為止，理由是大正 12 年為了使當時的皇太子（即昭和天皇）預定 4 月來台時，能讓台灣人仰皇德，且感念國恩，就命教務所贊事事務經理佐佐木芳照、本願寺布教使王兆麟到台灣各地演講，其日程是 3 月 27 日台北市大稻埕公學校（台灣人子弟讀的）、28 日台北市萬華、29 日基隆市、30 日屏東街、31 日高雄市、4 月 1 日台南市、2 日嘉義街、4 日新竹街、5 日台中市等的公學校。²¹由此史料，筆者推測王兆麟，成為本願寺布教使到以上各地從事演講，時間是大正 12 年 3、4 月時，而他留學的學校是京都市的龍谷大學。²²他回台灣之後，首先接到的工作，即是上述在台北等地的公學校的演講，此演講的結果，大正 13 年（1914）1 月奉本願寺台北別院佐佐木芳照之命為大稻埕布教所布教師，專向台灣人布教，並且經營大

²⁰ 同註 11 史料，頁 134、139。

²¹ 同註 11 史料，頁 210、211。

²²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1926）5 月 15 日〈講解佛教〉：台南彌陀寺住持王兆麟師能穀（應是龍谷之誤）大學畢業生也，學問淵博，深明梵理，猶長於說法。

正義塾。²³ 7、8月間，以本願寺布教師身份，於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義、高雄、鳳山、屏東、岡山、台南、鹽水等地巡迴布教。²⁴但是大正14年（1925）年9月輪番佐佐木芳照因故，一時決定中止大稻埕布教所，令王兆麟轉任於高雄。幸逢台南彌陀寺管理人黃欣、及紳士王昭德、莊輝鈔等諸氏之請，擔任當時無住持的彌陀寺的住持。王兆麟開始專心盡力修繕彌陀寺的廟宇，同時準備創立精神社，開始向各布教所或是工場的台灣人，巡迴演講。大正15年（1926）1月10日，於彌陀寺開設精神社，開始募集會員，訴之於內外紳士有力者的贊同。所幸會員逐漸增加，基金亦伴隨而至。²⁵精神社是基於大正12年（1923）11月10日，大正天皇御下賜的詔書中的「國家興隆之本，在國民精神的剛健，涵養之，振作之，不可不以固國本」²⁶而來。王兆麟更發行了《精神界》（月刊雜誌），²⁷又受大谷尊由教育女子的勸誘，又鑑於南台灣人

²³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924）2月7日〈真宗教會重整〉云：本派本願寺為本島教化事業，創立大稻埕布教所。自佐佐木芳照師到任以來，熱心計劃，漸次健實進步，此番將真宗教會章程重新整理，以期完備，命本願寺布教使王兆麟駐大稻埕主任會務。

²⁴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924）7月27日〈精神作興巡迴講演〉：本派本願寺布教使王兆麟氏自本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三日止，要巡迴全島重要各驛及布教所，為本島人講演佛教之精神。又該報大正14年6月5日〈翰墨因緣〉、又8月1日〈鳳山特訓、佛教講演〉。

王兆麟，〈彌陀寺住職辭任敘禮〉，載於南瀛佛教會編，《南瀛佛教》卷8之3（台北：南瀛佛教會，昭和5年（1930）3月1日），頁40。

²⁵ 大橋捨三郎輯編，《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開教史》（台北：真宗本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35年（昭和10年）5月），頁554。

²⁶ 同上註，頁553。

²⁷ 昭和2年（1927）3月15日《台灣日日新報》〈奉悼講話〉：台南彌陀寺住持本願寺布教使王兆麟師，卓錫來後，時在州下各地布教，且每月又編精神界

女子的向學心及實際家庭經濟狀況，及本於寺院該負的使命和實施宗教教育的急迫性，在獲得台灣當局的指導下，以本願寺台灣開教總長事務主任芝原玄超為創設人，在昭和 4 年（1929）4 月 17 日，獲得認可，暫時於彌陀寺創設台南家政裁縫講習所。向本島女子鼓吹上揭精神社的主義，立足於佛教的正信，鞏固國民思想，企圖培養本島家庭主婦的模範人物。又幸得以荒卷市尹為首，松平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長廣松，同第二高等女學校校長等其他為數頗多的人的援助，順利地完成發展。昭和 7 年（1932）4 月 30 日，州當局亦承認其實力，在送出第一屆畢業生的同時，也得到認可，將之改稱為台南家政女學院。²⁸院址仍然在彌陀寺，直到昭和 11 年（1936），州廳授與位在竹園町五仟多坪的土地，作為新校舍的用地（今台南市勝利路 41 號），當年有五個學級二百人，職員十一名。學生當中有一百零七名是學寮生，南有屏東、潮州人，北則自新竹、彰化來的女子，²⁹由此可知該學院的創立，對當時的女子來說，是一能受教育的好機運，這所學校就是今日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的前身。其中，有關該院以後至今的沿革，請讀者參閱拙著《台灣與

雜誌，以為度世寶筏。

同上報昭和 5 年（1930）8 月 4 日〈台灣精神社二周年記念行事〉：台南市東門町彌陀寺住持王兆麟氏，獨立主宰知台灣精神社之精神作興俱樂部，創立二周年，定來 8 日午前九時，在彌陀寺內舉行記念式。

《南瀛佛教》6 卷 1 期（台北：南瀛佛教會，1927 年（昭和 2 年）12 月），頁 78〈王兆麟氏之精神作興詔書圖解〉：本會理事台南彌陀寺住職精神主任王兆麟氏所述之精神作興詔書圖解，頗適時宜之著述。

²⁸ 大橋捨三郎輯編，《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開教史》（台北：真宗本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35 年（昭和 10 年）5 月），頁 203-204、555。

²⁹ 遲塚記者，〈台南家政女學院を訪ねて〉，收於《台灣婦人界》6 期（台北：台灣婦人社，1936 年（昭和 11 年）8 月 20 日），頁 91。

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642-651。

四、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彌陀寺及其人事變遷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終告結束，台灣因屬日本屬地，當時的同盟軍命中國國民黨軍隊進駐台灣，因此因緣，當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戰而戰敗之後，1949 年撤退到台灣來，在此前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緊接著而來的國民黨軍大量屠殺台灣無辜的百姓，戒嚴令的頒布，白色恐怖籠罩著台灣的天空，台灣的精英不明原因消失，佛教界的精英亦無法倖免，如台南市開元寺的住持證光師高執德。³⁰同是台南市的彌陀寺及其人事，在混亂的時局中，遭遇怎樣的局面呢？在〈民國六十九年彌陀寺重建落成石碑〉云：

日據時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此如來蘭若，凡經凌夷，風雨剝落，復呈頹敗。台省光復後，又漸趨荒廢。其後經管理人接管整頓，並於民國五十三年稍事修葺。但因限於財力，展佈為難。於是信眾等咸感非有悲願宏深，勤修福慧修行者晉山住持，無以更新鼎建。乃由管理人暨信徒代表，至關仔嶺大仙寺，禮請圓斌法師來寺住持。³¹

由此碑文，知道二次世界結束後的彌陀寺伽藍很荒廢，但寺內有四十三承租戶（含侵佔），³²不過人事方面直至民國 54 年（1965）聘請釋圓斌任住持為止，其間的管理人、住持是誰？是不清楚的。雖然已故釋

³⁰ 詳拙著，《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頁 161-197。

³¹ 楊圳益編撰，〈府城彌陀寺初探〉，發表於「2004 年台灣淨土藝術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2004 年 10 月 16、17 日），頁 31。

³² 同上註，頁 40。

開證曾口述，民國 44 年（1955）釋永達受請住持彌陀寺，因當時彌陀寺破舊無人，釋永達因忙於寺務過勞，於翌年 3 月 17 日圓寂。³³之後，彌陀寺好像呈現無住持的狀況，但是依據台南市政府於民國 78 年 12 月 12 日發文，字號「七八南市民調字第九六五一七號」中的說明有二：一、依據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福岡分處 78、11、30 亞福（78）字第 0807 號函辦理。二、本願寺台灣別院御本尊（阿彌陀如來）返還請求書及沿革資料留存本府，貴寺如須瞭解請前來本府民政局洽詢。³⁴

筆者注意到上揭資料的第二點中「本願寺台灣別院の御本尊について」所記述的「大体この弥陀寺と申しますのも、昭和二十年以前は本願寺教團の末寺であって、本願寺台湾別院に所属してお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そして昭和二十年までのこの寺の住職が本願寺僧侶であり、台湾人でもある王兆麟という人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ら、御本尊をこの弥陀寺にお移し申したようであります」，這則資料是說彌陀寺直至昭和 20 年（1945）為止，一直是本願寺教團的末寺，隸屬於本願寺台灣別院，而直到昭和 20 年為止的住持是本願寺僧侶，也是台灣人的王兆麟，因此關係，御本尊移至此彌陀寺。此御本尊就是原本供奉在本願寺台灣別院的阿彌陀像，也就是昭和 7 年（1932）本願寺舉行台灣別院大雄寶殿落成時，由日本本願寺親奉的阿彌陀佛像，此佛像一直是台灣別院的御本尊。在日本淨土真宗的信徒來說，視御本尊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甚至若寺院發生意外時，什麼都可不顧，但一定要搶救御本尊。所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歷經四十年後，日本真宗本願寺開始調查

³³ 同上註，頁 40。

³⁴ 此資料由今彌陀寺住持釋印弘提供，這份資料是由台南市政府函「七八南市民調字第九六五一七號」發給彌陀寺的公文，而該公文是依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福岡分處 78、11、30 亞福（78 字）第 0807 函辦理。

當時台灣別院的御本尊的下落，歷經確認，知道台灣別院的御本尊，在戰後由王兆麟迎奉至彌陀寺，結果於 1988 年 11 月 17 日派人訪問確認，並向台南市政府請求歸還，才有上揭公文。繼此公文之後，又有平成元年（1989）8 月 21 日佐賀縣基山町宮浦 815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因通寺いつくしみ顯彰會主管調寬雅致函亞東關係協會福岡分處處長曾彬祥，請求協助向台南市政府允許歸還該御本尊。在其「本願寺台灣別院御本尊（阿彌陀如來）御返還について御依頼」的委託書中，說明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傳教於台灣的始末，還有關於該御本尊的造形特色，說是住立空中尊，是韋提希夫人在被兒子阿闍世王冷禁的七重陋屋裏，依世尊的指示，禮拜觀察顯現在眼前的阿彌陀如來的形像，而是應聲即現，立攝即行的阿彌陀如來形像。又說明該阿彌陀如來佛像，由台灣別院移轉到台南彌陀寺的經緯，也就是因為到了昭和 21 年（1946），擔心台灣本願寺別院的存亡之際，被當時身任本願寺別院的臨時責任者王兆麟，將御本尊移轉至自己住持的台南市的阿彌陀寺。

除此以外，該委託書也介紹了王兆麟的僧侶身份，說王兆麟擁有妻室，育有子女，可說是典型的淨土真宗的僧侶。對於僧侶是否可擁有妻室，在日治時代曾是台灣佛教界議論的話題，但是成為日本佛教宗派的台灣僧侶，隨著歲月的轉移，逐漸為台灣社會所接納，當然具有如此身份的王兆麟，在戰前不會遭遇社會的質疑。但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僧侶，強調僧侶不結婚，也不許擁有妻室，加上台灣社會仍保有傳統佛教的觀念，所以王兆麟成為眾人批判的對象，最後終於被趕出彌陀寺。但王兆麟被趕出彌陀寺的年代為何？則不清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正 15 年（1926）王兆麟出任彌陀寺住持以來，一直到 1946 年他仍是該寺的住持，且還是淨土真宗台灣本願寺別院的臨時責任者。還有今日彌陀寺祖師堂內供有「重興彌陀寺圓寂比丘

淨土正宗釋德明和尚一位覺靈蓮座（筆者按：王兆麟）」，此中淨土正宗，應是淨土真宗之誤，又註明：釋德明是王兆麟，³⁵又《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禮俗宗教篇》第一章佛教第五節台南市之寺院彌陀寺欄作「民國十五年，僧德明主持重修」，由於民國 15 年即大正 15 年（1926），顯然僧德明是指王兆麟。³⁶

又筆者，在張文進《台灣佛教大觀》一書中，發現以下資料：一、時彌陀寺住持善明，管理人王明德、黃欣、莊燦鈴；二、至民國十五年，在廢頹難堪的情形之下，王善明師，毅然就任住持，並得管理人王居士等之幫助，即着手修建，民國十七年，竣工落成。³⁷從此資料來判斷，即民國 15 年（大正 15、1926），彌陀寺住持是王善明，從年代來推斷，王善明不就是王兆麟嗎？對照上揭資料，僧德明、王善明、王兆麟，豈不是同一人嗎？如果這個推測無誤的話，上揭釋開證的口述，即民國 44 年，釋永達受邀請任彌陀寺住持之說，就值得商榷，因為《台灣佛教大觀》出版於民國 46 年 9 月 15 日。

又發表於《南台灣研究》第一輯的楊書濠〈戰後台南市佛教團體的發展——以台南市佛教支會為例〉³⁸一文中頁 65，「念佛會組織」：彌陀寺住持善信法師，恢復該寺原有的念佛會組織，當時除了邀集本地的居士陳慈、黃漢英、李炳煌，並結合大陸來台的居士謝竹存、羅乃秋、趙河南等居士，於每星期的禮拜日下午，在彌陀寺聚會念佛，開始結合地

³⁵ 同註 30，頁 29。

³⁶ 台南市政府編印，《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禮俗宗教篇》（台南：台南市政府，1979 年 1 月），頁 74。

³⁷ 張文進，《台灣佛教大觀》（台中：正覺出版社，1957 年 9 月），頁 198。

³⁸ 《南台灣研究》1 輯（高雄：自然史教育館，2011 年 12 月），頁 44-72。

方佛教人士傳播佛法。³⁹這是引自民國 40 年(1951)7 月 31 日出版的《覺生月刊》資料說，當時的住持善信法師恢復該寺原有的念佛會，但同書頁 57「創辦佛教雜誌」：云：台南市佛教支會的團體會員，有鑑於佛教雜誌為推展佛教文化事業的重要工作，先後創辦了《法音雜誌》、《大乘雜誌》與《法海月刊》等刊物。《大乘雜誌》的創辦者為彌陀寺住持善明法師，當時其有鑑於台南為文化重鎮，卻沒有佛教文化機構，因此於民國 42 (1953) 發起籌辦出版大乘月刊，成為台南市最早發行的佛教雜誌。⁴⁰記述民國 42 年彌陀寺住持善明法師創辦了《大乘佛教》月刊，試想短暫的一年半歲月，住持由善信轉為善明，兩位是否同一人？以目前手中資料，不敢遽下結論。但是從以上資料來分析，暫作結論的話，是如以下：戰後的台灣，因日本放棄對台灣的統治權，盟軍以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台灣社會陷入混亂的情勢，佛教界亦難倖免，時身為日本淨土真宗僧侶的王兆麟，被迫交出直到紀元 1946 年為止所住持的彌陀寺住持之職，可是他可能沒離開彌陀寺，而是將日本僧侶的身份改為台灣傳統佛教的出家身，王兆麟的名稱，先後可能改為德明、善明、善信之名。

筆者敢作如此的結論，是有以下的線索可作依據。一者、前揭楊書濠文中，引據《覺生月刊》第 13 期，介紹善信法師恢復該寺原有的念佛會，及第 41 期，記述住持彌陀寺善明法師發起創辦《大乘月刊》，以王兆麟的經歷舉辦這些活動，應該是不用質疑的；二者、根據民國 54 年(1965)，接任彌陀寺住持釋圓斌的侍者釋印理的口述，⁴¹當她隨侍其

³⁹ 〈一月佛教〉，《覺生月刊》13 期（台中：寶覺寺，1951 年 7 月），頁 2。

⁴⁰ 〈新聞網〉，《覺生月刊》41 期（台中：寶覺寺，1953 年 11 月），頁 28。

⁴¹ 2013 年 5 月 17 日、於鳳山佛教蓮社。

師釋圓斌接任彌陀寺住持時，王兆麟的子孫尚住在彌陀寺。由以上二個線索，筆者推斷德明、善信、善明應與王兆麟是同人異名吧！如此推斷無誤的話，王兆麟任彌陀寺住持應是自大正 14 年（1925）至民國 43 年（1954）。

五、戰後中興彌陀寺的釋圓斌

戰後混亂的台灣社會，佛教徒特別是身負教團興衰的僧侶，如何對應？正是一大考驗。根據釋印理的口述，民國 54 年她與其師釋圓斌接任彌陀寺時，該寺已殘破不堪，生活上她們是依賴到市場撿菜過日子。當時釋印理尚未出家，但看到釋圓斌，堅毅不拔的衛教，弘法度眾的熱心，於民國 58 年（1969）出家，協助其師重建古剎彌陀寺。使古剎至今能屹立於台南市，發揮寺院的教化功能之外，更難能可貴的是，該寺保有許多明清以來的古物，甚至自古以來的寺產，除了因道路拓寬，寺前一些土地被政府徵收之外，大致都保存得很好，與開元寺作比較的話，寺產的維護是略勝一酬，而且主事者是位比丘尼，她是釋圓斌。

出家

談到釋圓斌，俗姓吳名金鳳，出生於民國 23 年（1934）5 月，100 年（2011）7 月 12 日圓寂享年七十八歲，僧臘五十九，戒臘五十四。父親是吳復，原住於高雄大寮後壁寮。日治時代是高雄糧食局局長、保正。1941 年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曾赴台北徵保正，赴板橋任台灣紡織廠廠長。戰後因國民黨官兵殺該廠守衛，吳復歸鄉，又逢連震東設糧食管制，被控以空賣空，吳復遂將在大寮所有土地賣掉，舉家遷至鳳山甕厝（今成功路 49 巷 5 號、巷口有隆記布店），後遷至今三民路 121 號經營鳳大碾米廠，時未出家的釋圓斌，幫助父親擔任會計的工作，因她在

日治時代畢業於大寮永芳國小，畢業後續升學於鳳山國小附設的中等學校。後因氣喘病，在接受中醫治療之後，始告全癒。後至鄰居陳施禮濟（曾任鳳山佛教蓮社董事、鳳蓮幼稚園園長、夫陳福海）處學作裁縫，常跟陳施禮濟到當地的龍山寺禮佛，播下出家的種子。當時屏東東山寺的某比丘尼曾來龍山寺當住持，或許這樣的因緣，釋圓斌到東山寺禮佛，進一步接觸佛教。十八歲就發心出家，但由於父母反對，所以過程非常軀折。她先到南部最大的比丘尼道場大崗山龍湖庵，後到超峰寺。父母找不到人，請算命的鮑察仙為她算命，結果算出是至遲十九歲、二十歲必會出家。當他在超峰寺被父母尋獲，一起回家時已現出家相，該年年底過年二、三天前，得到父母的允許，母親送她一條金項鍊作為出家的賀禮。後來她選擇到大仙寺禮心化比丘尼（台南中等學校畢業）出家，時十八歲，民國 42 年。⁴²

受戒、求學

未出家前已是中等學校肄業的釋圓斌，民國 46 年（1957）受戒於屏東東山寺，⁴³後赴台北進入十普寺舉辦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參學於釋白聖；⁴⁴47 年再到台中寶覺寺的佛學院求學，院長雖是釋智性（1884—1964），但其經營者是陳錦東（1923—1977）；⁴⁵慈明寺釋聖印辦的台

⁴² 以上依陳施禮濟之子陳義秋及釋圓斌之弟吳龍一、呂國男口述。

⁴³ 見《台灣佛教》10 卷 9 期（台北：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1956 年 9 月），頁 20「屏東東山禪寺冬季傳戒：為義敏老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傳戒」通啓，戒期 45 年 12 月 8 日至 46 年 1 月 8 日。

⁴⁴ 見《台灣佛教》11 卷 5 期（台北：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1957 年 5 月），頁 4「中國佛教三藏學院開學典禮：台北市十普寺白聖法師創辦」。

⁴⁵ 台中寶覺寺內佛學院，現已改組，刷新一切，定名為台中佛學院。該寺住持智性老和尚自任院長，於 2 月 12 日開始新學期，報到學員三十名，日常生活，

中佛學院就學，畢業後回到大仙寺擔任書記的工作。在釋開參的領導之下，大仙寺成爲崗山超峰寺派的道場，由於超峰寺雖在日治時代，道風仍深受中國福建鼓山湧泉寺的影響，⁴⁶戰後的大仙寺，自然地由齋堂轉爲鼓山風格的叢林道場。據其弟子釋印理的口述，當時大仙寺的僧侶管教非常嚴格，特別是其剃度師釋心化，在家時已受過高等教育，對釋圓斌的教育應有提升其修養品質的催化作用。民國 54 年，在釋開參的指令之下，擔任了台南彌陀寺的住持，一身挑起中興古刹的重任。

中興瓦礫中的彌陀寺

釋圓斌接任彌陀寺之初，彌陀寺的大殿建物已嚴重腐朽不堪，寺後寮房又爲王兆麟的後代子孫等所使用，但重建工作事不容緩。民國 60 年（1971）開始重建，歷經十年，遂於同 69 年（1980）竣工，舉行落成典禮。⁴⁷今古刹重現，巍峨殿宇，金像輝煌，講堂禪房，煥然一新，是一俱時代之創建。依據陳清香於〈圓斌法師與台南彌陀寺〉文中的描述，說：

民國 69 年底，重建新寺宇終於落成。在千坪左右的建築空間中，以現代式的鋼骨結構，砌建了上下三樓層為殿宇，殿宇輝煌，中軸線上，前為山門，左右立著兩尊金剛護法神像。正殿三層，一樓為大雄寶殿，二樓為西方三聖殿，分別供華嚴三聖及阿彌陀、大勢至、觀世音三聖像。後殿三層，一樓為地藏殿，供地藏菩薩與達摩祖師像、王兆陞知縣像，二樓為圓通寶殿，供千手觀音像，

皆模範叢林儀，教法亦有配合教育。見《台灣佛教》9 卷 2、3 期（1955 年 3 月），頁 24；《台灣佛教》12 卷 2 期（1958 年 3 月），頁 23。

⁴⁶ 詳見拙著，《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頁 197-211。

⁴⁷ 民國 69 年重建落成石碑。

主殿與護龍頂上架亭閣，前後相通，整個殿宇外觀仿北方宮殿式，綠瓦紅柱，相互輝映，在當年是十分新穎，流行的時尚，彌陀寺儼然成為南台灣佛教聖地。⁴⁸

重建的彌陀寺的外觀引人注目之外，其內部的裝飾也是頗具藝術價值。陳清香在上文中作如下的敘述：

她請來民族薪傳得主潘麗水畫圓通寶殿飛天，又請台南府城著名佛畫家蔡草如（1919—2007），在仿宮殿式樑坊、柱頭及壁面上，作全面的彩繪裝飾。其中每一殿宇樑坊上的飛天，彩帶飛舞，傳承著敦煌壁畫的神韻。而西方三聖前上下左右各兩幅壁面，下端畫山水樹林，上端畫了左右兩尊海上觀音像的彩畫，都是畫浮在萬頃波濤中的觀音。其中右側觀音像，在至尊觀音像之外，另畫合十禮拜的善財童子像。……圖中觀音以大片山岩為背景，山岩高處有瀑布傾洩而下，觀音背倚竹林，盤坐在大石上，旁置淨瓶，鸚鵡飛翔天空，面對一片水域，觀音頂戴化佛冠，頭披白色巾帽，長髮垂披兩肩，法像莊嚴，胸飾瓔珞，白色衣紋線條轉褶流暢，左足跨在右膝之上，右足下垂踩在綠色蓮華紅色花瓣的花托之上，頭挽童髻，雙手合十，髮帶與衣巾隨風飄起，一派天真童稚之像，正向觀音菩薩請益。⁴⁹

從以上的描述來看，可以知道釋圓斌頗有藝術修養，其眼光也不俗，或許這與她所受的教育有關吧！也可從此角度來看她對信眾的教育。根據其弟子釋印弘等的口述，釋圓斌在法會中能唱誦能講經，爲了

⁴⁸ 《護僧》64期（高雄：中華佛教護僧協會，2011年9月），頁3。

⁴⁹ 同註46，頁3-4。

讓信眾對所讀誦的經典或是懺本，作名相簡解，如《慈悲三昧水懺名相簡解》、《大悲心陀羅尼經出相手相解》、《般若波羅蜜多經講義》《大方廣佛華嚴淺釋》、《佛學淺說及佛的故事》、《佛的本生故事》等。名相簡解者，是針對經典與懺本中的名相即佛教術語，作表解及淺釋，還有作標點及注音，相信信眾看了這些著作之後，對經典懺本中，所說的教義多少能夠了解才對，對佛教教法的弘揚是有相當意義的，雖然其著作可能夠不上學術的層次，但從傳教的角度來說，也是值得贊嘆的。

護寺產

除此以外，還有一件值得給與高評價的事，即是她善於保護彌陀寺的寺產。在此說的寺產，如前其弟子釋印弘、釋印理的口述，在她剛接彌陀寺住持時，彌陀寺內尚有王兆麟的子孫及他人佔住，在盧嘉興的〈再談台南古刹彌陀寺〉也說：「光復後雖屢有修葺，但四周環境因寺地多經出租或被佔建，逐漸陷於雜亂無序，殿宇亦已腐朽不堪，自圓斌師住持就以重建為己任。」⁵⁰她費了二十二年的時間，將他們佔住 600 多坪的土地收回，還有一件值得我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氣與毅力的事。談起這件事，得先回顧康熙 57 年（1718），監生董大彩重建中殿一座，同 58 年（1719）一峰募建閻君殿於西邊暨僧房六間，監生陳仕俊建三宮殿於東邊，如此彌陀室改名為彌陀寺，並置寺田於鳳山縣嘉祥里阿噠甲尾（現高雄市阿蓮鄉甲尾）、園一所，年收粟七十二石。⁵¹這份寺產，在台灣三七五減租之後，尚有阿蓮中正路和蓮段與崗山營八筆契約，計有十二筆

⁵⁰ 盧嘉興，〈再談台南古刹彌陀寺〉，原刊於《古今談》78 期，重刊於《台灣研究彙集》12 輯（台南市：盧嘉興印行，1972 年 8 月 30 日），頁 17-18。

⁵¹ 見〈嘉慶 10 年（1805）重建彌陀寺碑記〉，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南部碑文集》（台北：國史館，1994 年 7 月）。

土地。⁵²雖然都承租給人，但能在時局混亂中，仍能保護 1719 年時陳仕俊所捐獻的寺產是不容易的事，這比較同樣是古剎的開元寺來說，更是值得我們加以贊賞。

六、結論

自古以來，台灣寺院的伽藍，因建材的關係，經常三、五十年都會重建一次，再加上天災，還有戰爭，所以原有的建築風貌，幾乎未能留存於世，就以台南四大古剎來說，保有文化遺產之名的是開元寺、法華寺而已，且其建設的年代是在日治時代。至於竹溪寺及彌陀寺的建物，則都是戰後的成品。其中，日治時代時，在王兆麟擔任住持下重建，而戰後殘破不堪的彌陀寺，是在釋圓斌的努力下，再重復彌陀寺的風貌，使台南市四大古剎，能屹力於世。雖然建物已無往昔的風貌，但地點不變，而且寺內仍然保存許多歷史文物，如正殿一樓有嘉慶年間（1799—1805）塑的伽藍、韋陀的護法，二樓則有同嘉慶年間的十八羅漢。後殿三樓有同嘉慶年間，泥塑的觀音、善才、童女像；一樓右側供奉的達摩祖師像，是嘉慶年間（4—10 年、1799—1805）的造像，材質是泥塑，高度約 96.5 公分（蓮座 15 公分）；左邊王兆陞肖像，是清治時期第三任台灣縣知縣，他康熙 27 年（1688）就任台灣縣知縣，同 31 年（1692）建彌陀室書院，即日後彌陀寺的前身。⁵³

這些歷史文物能傳至到今天，可以讓我們了解彌陀寺的住持，特別是王兆麟，釋圓斌，他倆對歷史文物的重視，同時也可藉此明白他倆所

⁵² 以上資料，由現任住持釋印弘提供。

⁵³ 高拱乾，《高纂府志》卷 2（台北：台灣總督府，康熙 33 年（1694）編纂，35 年（1696）刊行），「規制志書院」。

受的教育，是一重視歷史文化的時代。雖然釋圓斌看似戰後的人物，但他未出家前，即其人生的基礎教育是在日治時代，即使出家、受戒到其參學的學院，如台中寶覺寺的陳錦東、慈明寺的釋聖印也都曾受日式教育的人，從如此的角度來思量，釋圓斌護寺產、保護寺內故有文物、弘法布教的史績，同樣是鳳山人出身的筆者，除了深感敬佩之外，更能感受到僧侶受教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台南市政府編印，《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禮俗宗教篇》，台南：台南市政府，1979年1月。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北：國史館，1994年7月。

高拱乾，《高纂府志》，台北：台灣總督府，康熙33年（1694）編纂，35年（1696）刊行。

張文進，《台灣佛教大觀》 台中：正覺出版社，1957年9月。

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1月。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年5月。

[日]杉山靖憲，《台灣名勝舊蹟誌》，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年（大正5年）4月。

[日]大橋捨三郎輯編，《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開教史》，台北：真宗本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35年（昭和10年）5月。

二、論文

楊圳益，〈府城彌陀寺初探〉，發表於「2004年台灣淨土藝術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2004年10月16、17日。

三、雜誌、報刊

盧嘉興，〈再談台南古剎彌陀寺〉，原刊於《古今談》78期，重刊於《台灣研究彙集》12輯，台南市：盧嘉興印行，1972年8月30日。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台灣總督府，1896—1944年。

《台灣佛教》9—12卷，台北：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1956—1958年。

《南台灣研究》1輯，高雄：自然史教育館，2011年12月。

《南瀛佛教》6—8卷（1941年改名為《台灣佛教》），台北：南瀛佛教會，1927—1930年。

《覺生月刊》13期，台中：寶覺寺，1951年7月。

《覺生月刊》41期，台中：寶覺寺，1953年11月。

《護僧》64期，高雄：中華佛教護僧協會，2011年9月。

[日]遲塚記者，〈台南家政女學院を訪ねて〉，收於《台灣婦人界》6期，台北：台灣婦人社，1936年（昭和11年）8月20日。

